

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史论』最终成果

中国古代学校

教材史论

ZHONGGUO GUDAI XUEXIAO JIAOCAI SHILUN

吴洪成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史论』最终成果

中国古代学校

教材史论

吴洪成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 保定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史论 / 吴洪成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66-1132-1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教材-教育史-中国-古代 IV. ①G423.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0735号

责任编辑: 胡素杰

装帧设计: 王占梅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邮 编: 071002

印 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26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56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6-1132-1

定 价: 45.00元

前 言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主要指古代社会学校产生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官、私学及书院教学活动中使用、具有某种记录载体形式的课程资源、素材及信息内容，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达到教育政策要求及人才选拔取士的重要手段。从教育教学各个因素组成的结构分析，学校教材虽然处于微观及媒体技术的层面，却与整个教育的系统不可分割，甚至决定了教育工程的成败及教学质量的效果。但由于历史久远、资料分散，搜求整理极其困难，所以直到当今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甚为稀缺，需要加强。本书写作的缘起便在于此。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材紧密依托学校教育的类型、办学的层次，因此，教材的历史与官、私学，书院的变迁、制度设计及内容要求密切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程度有差异，政治、经济对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要求不同，有关学术思想和教育理论也有变化。所以，即使在秦汉以后超稳定的大一统封建社会结构下，学校教材仍然是不断嬗变，并呈现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和风格。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挖掘和分析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许多具体的问题有待今后有条件和时间的前提下进一步展开。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材，是以儒家经典文史、文献典籍以及文学诗赋、词章为主的，这是儒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所规范和限制的产物。但是，古代学校教材的类型、内容及体例等方面其实并不局限于此。官学教育中仍有专科技术教育的学校机构，国家文化教育

机构以官学为代表，太学、国子监在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尤其是学生的课外阅读自学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同时，各家各派，甚至科学技术的流派思想及教材的编写使用，在私学与书院中更为多见。这就告诉我们对古代学校教材的理解和认识需要有所调整，当然，进一步的例证及生动的素材内容尚需进一步整理。

古代教育不像近现代教育有严格的体系、管理规章、升级及考评制度，所以，无论是教育组织、课程编制、教材使用和教育评价都有粗放及自由的一面。其中，严格的教材编写、发行和教学评估的环节、程序等方案都没有定型，因此，学校教材的考察和分析只能结合学校的教学活动、课程内容及教学过程的场景加以理解和体会。可以认为，许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是根据人才选拔制度，尤其是科举考试的要求，国家文教政策的规定，以及自己的专业特长选编讲稿，或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阅读、自学来完成教学任务的。由此，就会带来教材体系、内容、目标及程度要求等方面的差异，也使许多教材淹没在教育行为及活动过程中而无法让我们清晰把握。这是研究古代教材史的难题，也是迷惑或尴尬。但是，从当代教育理念思考，又能展现师生互动、课程资源的开发等精彩的实证资源和案例。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材是学术文化的积淀产物，充分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学派思想起伏波动、重心转换、内容嬗变、观念更新以及思想流派之间的角逐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学多样性成分和内容在学校课程和教材这一领域得以聚焦与汇合，换言之，由此也可以折射出古代学术思想史发生、演绎的历程和脉络。因此，古代学校教材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中国教育史的传统资源和历史素材，而且有裨于学术思想的另类解读。

吴洪成

于京南门户保定河北大学主楼 607 教科所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1 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学校教材	(1)
第一节 远古的教育活动及学校的产生	(2)
一、远古人类生产劳动与教育的主要内容	(2)
二、文字的起源	(5)
三、学校的产生	(6)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学校教育及教材	(8)
一、夏代的学校教育及教材	(9)
二、商代的学校教育及教材	(11)
三、西周的学校教育及教材	(13)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教材	(18)
一、文化教育的变革与学校教材	(18)
二、儒墨私学教育家的教材观	(19)
三、孔子对古代学校教材的贡献	(24)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学校教材	(30)
第一节 秦代的学校教材	(30)
一、秦代的文教政策与学校教材	(30)
二、《为吏之道》	(31)

三、识字教材	(33)
第二节 汉代的学校教材	(33)
一、经学教育与学校教材	(33)
二、河间献王刘德对经学教材的贡献	(46)
三、汉代的官学教材	(55)
四、汉代的私学教材	(60)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教材	(70)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特点与学校教材	(70)
一、儒学独尊地位下降后的学校教材格局	(70)
二、玄学对经学教材的冲击	(73)
三、佛学对经学教材的影响	(7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教材	(77)
一、三国的官学教材	(77)
二、两晋的官学教材	(85)
三、南朝的官学教材	(87)
四、北朝的官学教材	(9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教材	(91)
一、三国的私学教材	(92)
二、两晋的私学教材	(93)
三、南朝的私学教材	(95)
四、北朝的私学教材	(98)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校教材举要及分析	(100)
一、几类教材介绍	(100)
二、官、私学教材的简要分析	(103)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学校教材	(105)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与学校教材	(105)

一、“重振儒术”与学校教材	(106)
二、“兼重佛道”与学校教材	(107)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官、私学教材	(109)
一、官学教材	(110)
二、私学教材	(124)
第三节 唐代学校教材发展的归因分析	(128)
一、文学的繁荣与学校教材的变动	(129)
二、佛学宗教教育的教材	(132)
三、科举考试对学校教材的制约	(133)
四、印刷术的兴起与学校教材的印行	(135)
第四节 隋唐时期教育文化交流与学校教材的传播	(138)
一、学校教材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139)
二、学校教材传播日本	(140)
三、学校教材传播朝鲜	(141)
第五节 隋唐时期蒙学教材举要	(142)
一、《急就篇》	(143)
二、《开蒙要训》	(144)
三、《太公家教》	(144)
四、《蒙求》	(145)
五、《兔园策府》	(146)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学校教材	(149)
第一节 宋代的学术思想与学校教材	(149)
一、理学教育思潮与学校教材	(150)
二、功利主义教育思潮与学校教材	(155)
三、心学教育思潮与学校教材	(161)
第二节 宋代官、私学及书院的教材	(162)
一、宋代官学的教材	(162)

二、宋代私学的教材	(169)
三、宋代书院的教材	(175)
第三节 辽、金、西夏、元官、私学的教材	(181)
一、文教政策与学校教材	(181)
二、辽、金、西夏的学校教材	(183)
三、元代的学校教材	(187)
第四节 宋元时期学校教材的刻印及流布	(203)
一、宋代国子监主持编印的学校教材	(203)
二、地方官学刻印的学校教材	(209)
三、宋代学校教材在少数民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扩散	(210)
四、元代学校教材的刊印及发行	(212)
第五节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	(216)
一、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蒙学教材的贡献	(216)
二、宋代蒙学教材体系形成及《三字经》的个案分析	(218)
三、宋元蒙学教材编写的历史经验	(220)
第六章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学校教材	(222)
第一节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文化学术的变动与学校教材	(223)
一、程朱理学地位的确立与学校教材	(224)
二、自然科学的自西徂东与学校教材	(228)
三、实学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学校教材	(231)
第二节 明代官、私学及书院的教材	(234)
一、官学教材	(234)
二、私学教材	(238)
三、书院教材	(240)
四、学校教材刻印及在朝鲜的流播	(245)
第三节 清代（鸦片战争前）官、私学及书院的教材	(247)
一、官学教材	(249)

二、私学教材	(256)
三、书院教材	(264)
第四节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几部蒙学教材介绍	(286)
一、《幼学琼林》	(286)
二、《龙文鞭影》	(288)
三、《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及《训蒙骈句》	(288)
四、其他蒙学教材	(293)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00)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学校教材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定论。这一论点表明：人类创造性的劳动，不仅开启了人类种群的智慧，还触发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始终伴随着这一过程，并在其中体现出重大的作用。它既是维系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传播知识文化及生产、生活技能的途径。在原始社会，当远古人类制造出第一件劳动工具，并将此类工具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技巧传授给他人时，教育的现象便自然产生了。这个过程既是人类主观意念的导向，同时也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换言之，教育现象是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而逐步衍生出来的。其中包含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制作工具，有意无意的传授，有意无意的学习，还是自身的感悟都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智力活动和知识传播途径。远古时代的教育，作为这一过程的核心活动，成为人类生存和种族延续的必要手段。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项复杂活动，实践性强，影响因素多元，与人类的生存、延绵与发展始终伴随，是具有永恒性的一项事业。在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初期，教育尚未成为独立的专门形态，非制度化的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生活、宗教及艺术等活动结合进行的。教育活动与上述活动的内容相对应，教材缺少文字及记录、传承的载体，专赖口耳相传、耳提面命的方式。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早期学校处于萌芽状态，教育内容与教材方式有所变化，而真正发生显著变化则是在奴隶社会制度确立及学校正式产生之后。从远古到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期。由于距今历史久远，所存史料有限，使得我们对当时学校教育及学校教材的真实状况以及详情不能完全弄清楚，有雾里看花之感。近年的考古发展及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在推演的基础上做一粗略的描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文字记录的典册与学术流派的讲学传播一道蔚为学

校教材的丰富样式，并出现了对课程内容及教材编写的观念主张。

第一节 远古的教育活动及学校的产生

远古人类的教育与其社会生活的需要紧密相连。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知识及技术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由此可知，社会生活与远古人类的教育是相伴随的，人类不同的生产劳动组织方式也就决定了人类不同的教育内容。

一、远古人类生产劳动与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原始氏族社会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教育的目的是教授氏族成员生存的知识及技术手段。从教育内容及方式的层面透视，远古教育活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生存技能的氏族封闭性。氏族中个人的发现或发明仅在氏族内部传授，成为氏族成员共同享有的知识和技能，这样不仅促进了整个氏族部落的生产发展，还能提高了整个氏族部落的生存能力，但却很少向氏族以外的人传授。现在发现的大量的考古学、文献学及民族学的资料，均表明了这种生存技能在氏族内部的封闭性。比如被大众所周知的“人工取火”方法，各个氏族部落的取火技术就各有差异：佉族主要采用摩擦的手段，苦聪人常采用锯竹这一方式，黎族掌握了钻木的方法，而景颇族则主要通过压击进行取火。取火方式与技能的微妙差别，是不同氏族部落间生存方式及生产技能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对于氏族内部而言，各个部落之间生产方式的传授是毫无保留，且一成不变的，某项生产技术的专长一旦发明，就有可能保留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而对于氏族外部来说，由于深受氏族血缘关系的苛刻限制，教育的传授兼具保守性与封闭性，同时，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教育传统影响深远且延绵不绝的历史依据之一。其次，受教育对象幼龄化。远古氏族劳动力多寡直接关系到氏族成员的生存问题。因此，使氏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族成员尽早掌握生存技能成为氏族社会教育的首要问题。当时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是狩猎捕鱼,这是极其需要技巧性的生存技能。现代民族学的部分资料也辅证了“狩猎技术教育从幼童时就开始”这一特征:我国的鄂温克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该族儿童在七八岁时就已开始进行狩猎教育,幼童通过跳远、跳高、射箭打靶等相关的体能训练,早早掌握了生存手段及经验技能,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培养了兴趣爱好。这种现象,在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及非、美洲等氏族部落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再次,教学手段为现场教学。在氏族公社阶段,成人将自己的亲身经验通过在日常的生产劳作传递给下一代。这种教育的传授,并未遵循专业化的施教程序,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行为及广泛的生产实践中的。中国是世界农业的主要起源地,农业生产技术涉及的内容十分广博,不仅包括农作物的耕种方法,还涉及农耕工具的使用及制作,人们主要是通过成人经验的导向下进行亲身体验来获得农业生产技术。这种经验的导向及亲身体验的活动,成为氏族公社内部进行自发教育的重要形式。

以下引证中国上古史的典籍及资源对此期教育内容加以进一步说明。远古群居时代,有对火使用的教育内容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蜾蜋,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①《汉书》亦有“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的记载。由茹毛饮血的生食,到学会使用火,吃到熟食,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渔猎采集时代,他们的教育内容就是怎样团结互助进行集体的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怎样与猛兽搏斗,与自然力抗衡,以求得种群的延续,如战国时期政治家、道家后继者尸佼的《尸子》卷上记载说“宓戏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也”,“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而在畜牧农耕时代,他们的教育则在于如何畜养牲畜,如何进行农耕,保证社会生产。西汉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重要著作《白虎通义》卷1称:“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农业生产技术教育是原始社会氏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谈及农耕技术,我国古代文献中大量记载着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易·系辞下》中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修务训》提到了关于神农尝百草的典故:“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本之实,食羸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硇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其所就。”

^① 《韩非子·五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新语·道基》也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

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生活经验积累增加，文明水平极大提升。人们往往借助口头传说、神话故事及歌谣，记载并传播以往的知识或经验。因此，乐舞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知识教育的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吕氏春秋·古乐》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样的乐舞篇章，仅从其主题来看，就已涉及农业、畜牧、图腾、祭祀、伦理及自然万物的各方面知识。《尚书大传》卷1有“阳伯之乐舞株离”“仪伯之乐舞鬻哉”“夏伯之乐舞漫或”“羲伯之乐舞将阳”“秋伯之乐舞菜傲”“和伯之乐舞玄鹤”“冬伯之乐舞齐落”之类的记载，这类乐舞模仿了农作物生长的全过程，包含了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物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形象地记录了生产操作的技能。另外，上古乐舞还具有记录历史上英雄伟绩的作用。《周礼·春官·大司乐》曾追述黄帝、尧、舜及禹的乐章，郑玄注称乐章的内容：黄帝之乐《云门》《大卷》，表彰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大咸》《咸池》赞美尧能“殄均刑法以仪民”；《大磬》之乐歌颂舜德能绍尧之道；而《大夏》之乐则颂扬了禹“治水傅土”的功德。

由于对自然力的畏惧，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无法解释，于是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在“梦”的启迪下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宗教教育的突出表现在于占卜和巫术，占卜的方法是在猪、牛、羊的肩胛骨上面用火灼出裂纹，由裂纹来判断吉凶。这种活动发展到后来导致了一些专门从事占卜活动的巫者的出现，巫者被视为当时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行走于各群体之间进行占卜的预测。

神话故事对儿童也颇有教育意义，流传至今的远古神话大都宣扬正义，鼓励勇敢，例如流传后世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斗天帝”等神话故事，都生动地再现了远古祖先们与大自然斗争的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马克思曾盛赞希腊神话是生动的教材，我国的神话故事也同样具有此功能。

远古教育活动的教育内容丰富广泛，以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所直接需要的知识素材、技能技巧为主，兼及艺术、宗教及道德等方面的资源。并且随着原始人、部落、氏族公社（分母系与父系两个阶段）的社会历史演进而表现出教育活动及内容的前后赓续和程度水平差异；当然，从横向考察，存在着山区、平原、江河、沿海及丘陵等不同地域教育活动及内容之间的独特风格特征。从广泛意义上而言，这些传播信息内容都是广义的

教材，只不过是属于非制度化教育活动的教材。

二、文字的起源

学校及所使用的教材无一不与文字记录的历史典籍、文献的载体及传播内容和方式相伴随。后者的形态、技术及传播方式与文本符号信息内容一样，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革命或工具制造的阶段递嬗是一致的。

我国文字，依传统说法，为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发明。《韩非子·五蠹》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仓颉作书的传说，战国时正在流行，这是文字学最初的雏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飭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治，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①《淮南子·本经》还加以神秘的渲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东汉许慎、高诱对此所作注释称：“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②

汉字产生于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这个时代与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体吻合。有关汉字起源的问题，学术界一向争议较多。20世纪初发现并开始有计划发掘的殷墟，已证实商代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汉字，它所记录的商代文明的内涵，也非常丰富广大。但甲骨文字已是相当进步的文字，单字已有四五千个，其语法和句法也已系统化和定型化。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甲骨文的功能也很完备，在目前所发现的总数达15万片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商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组成情况，官制、军事、法律、战争、方域、贡纳、农畜牧渔业和商业、手工业、交通、建筑、天文、历法、气象、医疗疾病、宗教祭祀、卜占等各个领域的状况，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字系统显然不是汉字草创时所能够具有的规模。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一定还有一种或数种彼此关联并逐步深化的汉字形式。

文字学家认为，中国汉字的发明，应从陶符讲起，并且与记事符号有一定的关联。

^① [汉] 许慎著：《说文解字叙》，熊承涤主编：《秦汉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页。

^② [汉] 刘安等著，徐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421页。

关于原始记事方法，则主要有：一是物件记事，即以实物来记录数字或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二是符号记事，即以物件为标志或在物件上刻出一些符号以表达思想。结绳记事是符号记事的一种。《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都用过。唐代学者李景祚在《周易集解》所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有的民族还利用刻木帮助记事。清人严如煜在《苗疆风俗考》中记载，苗民“惧有忘，则结于绳，为契券，刻木以为信”，太古之意犹存。三是图画记事，即用摹绘事物的形象来记录事情和表达思想感情，也称“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化来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象形”解释为“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图画文字只能称“文”，而不能称“字”。《说文解字叙》中便说“依类象形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象形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便同图画分离，按照与语言结合的道路发展。

三、学校的产生

文字的产生是萌生学校的直接条件。世界上最早产生文字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自然而然成为最早诞生学校的国家。相比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政权嬗变，唯有中国一直基本处于朝代相传的稳定发展之中，华夏文明的发展亦如绵延的长河一直流传至今，影响和带动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从古至今不断连续嬗变着的。

（一）原始学校的萌芽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来源于中国远古时代原始氏族社会盛行的有关“养老慈幼”的价值观念或生活习俗。这些有关先秦时代的“养老”和“慈幼”的观念和习俗产生了许多教育现象，成为探求中国史前教育形态的重要线索。

生活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的老者是氏族内部最为敬重的对象。每当氏族部落的首领遇到重大的问题无法应对和解决时，便会向老者进行请教，老者凭借充足的阅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对部落首领进行说教和指点，这便构成了最为古朴的教育现象。《尚书·尧典》中曾记载，首领舜遇到问题时会向年长的“四岳”求教；《吕氏春秋·尊师》中明确提到了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分别拜悉诸、大挠、伯夷父、伯招和子州父为师。这些记载虽无从考证，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在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一定阶段，还未出现稳定的家庭或私有制，氏族中老人与孩子共居一所，儿童被视为氏族群体的共有财产，由氏族部落共同抚养，这是一种比较普

遍的社会现象。庠不仅是虞舜时期的学校，同时还成为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的场所。庠在这一时期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先民集体贮存粮食、剩余猎物和畜养动物的地方。从字形构造来看，“庠”有房宇之内畜养牲畜之意，《礼记·明堂位》说庠又称米廩，是贮藏谷物的地方。二是集体赡养不具有劳动力的儿童和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的场所。老人与儿童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老人将祖先传说、部落规则及生产生活经验传授给幼童，庠成为氏族老者对晚辈进行保育与教育的场所。这种教育功能的获得，是氏族公社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庠还是氏族成员在农闲和狩猎之余进行劳动产品消费和尽情聚会的重要场所。《诗·豳风·七月》中记载：“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形象描绘了公刘时代，冬闲之时，周族聚会“公堂”，享用羊羔，觥筹交错，相互祝福的场景。这里的“公堂”与“庠”的性质相似，《毛诗》谓此为“学校”。

儿童是氏族血脉延续的希望。“爱幼”，不仅是动物保护自身物种生存的一种本能，更是反映了人类对于延续自身文化价值的渴望。当上古先民们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时，除了祈祷灵魂常住，还会祈愿将祖先们世代相传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代，这种愿望的实施构成了上古原始教育末期学校教育的雏形。

（二）夏代正式出现学校

学校教育的产生需具备一定条件：1. 阶级分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财产的增加，原始社会公有制逐步被私有制代替，因此有了阶级分化，出现一些不需要用体力的阶级。他们有时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和学习，使教育成为可能。2. 人类活动内容增多，形式多样。人类诞生之日起，社会活动便不断发生，无论是结绳记事还是刻木记事，随着时间的积淀，都已无法流传表述完整，口耳相传已不适宜传递间接经验。另外在人类劳动和生产基础上产生的音乐、文字、礼教也成为间接经验的一部分，这些知识需要有专门的组织来进行传授。3. 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使文明得以传递。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是学校教育产生的先决条件。只有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用系统的文字表述出来，才能建立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学校。这些经验总结进而成为学校教育的教材。4. 时间的限定与空间的固定。当人类意识到教育应从最初原始的终身随意教育状态转化为只对某一年龄阶段的受教育对象进行限定时间的教育后，才会产生学校教育。另外，原始的渔猎和游牧生产方式，逐步为农业生产方式所替代，人类从分散不固定的居住形式转向相对集中的定居形式，这为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能。

从学校的“校”字来说，“校”字从“木”从“交”。据考证，“古代交声多含有教的